

论《孟子》的文体互渗现象及其文学效应

潘莉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0;

摘要:《孟子》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典范,其文学成就不仅在于逻辑严密的论辩和气势磅礴的文风,更在于其文本内部复杂的“文体互渗”现象。《孟子》在散文这一主体形式下,有机融合了对话体、寓言体、论辩体、叙事体乃至诗歌的比兴手法。多文体的交叉与渗透,极大丰富了《孟子》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使其在严谨的逻辑推演之外,更具形象性、故事性和情感冲击力。这种文体互渗融合现象,是其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保持强大文学魅力与思想活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孟子》; 文体互渗; 对话体; 寓言; 艺术效果

DOI: 10.64216/3080-1494.25.11.067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诸子著作往往呈现出文体未分的混沌状态。《孟子》处于从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关键阶段,其文本形态具有典型的复合性。

《孟子》的论说性文章,其主体是成熟的说理散文,以逻辑论证、对话驳难、比喻说理为主要特征。有机融合了对话体、寓言体、论辩体、叙事体乃至诗歌的比兴手法。这种多文体的交叉与渗透,极大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1 《孟子》文体形态相关研究评述

梳理前人研究,关于《孟子》散文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论辩艺术、语言特色或思想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论及《孟子》散文文体,如社科院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孟子》文体归为“语录体”,认为其“作为论说文,形式大都还不完备^[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孟子》“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2]”。谭家健注意到《孟子》散文中“问答式”行文方法的运用,并认为正是这种形式的运用,让《孟子》散文“产生了非凡的艺术效果^[3]”。章沧授指出《孟子》散文的显著特色是已“发展到有对话场面的描写、人物情态的刻画以及互相辩驳驳难^[4]”。袁行霈对《孟子》在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给予界定,认为“《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5]”。以上这些学者都注重从单一文体角度研究《孟子》散文,注意到其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但是对于《孟子》散文蕴含的其它文体形态没有给与足够关照。王艺雯通过对《孟子》文本详细统计分析,认为《孟子》处于从语录体向对话体嬗变的状态,但《孟子》的语录又不同于《论语》《老子》的语录,而是蕴涵着专题论文特点的语录形式;《孟子》

的对话体也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的,根据实际情况又可分为问答体和对话体两种基本形态^[6]。王艺雯关注到了《孟子》蕴含丰富文体形态的文本事实,并对其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地位给与很大关注,但是对于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及其艺术效果论述还不够。

综上,本文在细读《孟子》^[7]七篇核心文本基础上,辨析其中不同文体的构成要素,系统分析各类文体在《孟子》中的呈现方式、互渗机制及其所产生的独特文学与思想传播效应,以期深化对《孟子》文学价值与文体创新的认识。

2 《孟子》的文体互渗类型及功能

《孟子》的文体融合对话、论辩、寓言与政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其功能不仅在于记录思想,更通过文学化的表达实现政治批判、社会教化与经典传承,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文以载道”的典范。

2.1 《孟子》中的主导文体

对话体为表,论辩体为里。《孟子》的整体框架建立在对话体与论辩体之上,二者互为表里。《孟子》全书以孟子与诸侯、弟子、论敌等的对话构成主体,这些对话有问有答,有来有回,层层推进。这种形式创造了具体的论辩场景,使抽象哲理在具体的人物交锋中展开,如《梁惠王上》中与齐宣王论“仁政”,《万章上》中与弟子万章关于儒家义理的讨论、辨析与切磋,《公孙丑下》中与告子辩“性善”等,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极具戏剧性和真实性,使读者如临其境,仿佛亲耳聆听孟子的教诲与辩论。“孟子在文章中可以借助想象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场景,可以为读者来丰富的想象空间,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孟子描绘的场

景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场景也能去感染读者^[8]。”

《孟子》在对话的外壳下,包裹着严谨的论辩内核。“《孟子》中主要是对孟子游说诸侯以及跟人谈话进行的记录,而他的思想和观点大多在跟别人争辩中表露出来的,因此,《孟子》所记录的大多是孟子本人跟其他思想的辩论,其基本上是以论辩文出现的^[9]。”孟子善于运用逻辑推理与比喻,形成独特的“论辩体”。孟子善于运用类比推理、归谬反驳法、层层递进等逻辑手段,构建其“仁政”“王道”“性善”的理论体系。在《滕文公下》中孟子驳斥陈相弃儒从农,揭示矛盾,运用的是归谬反驳法,在《告子上》“鱼与熊掌”章,孟子从生存需求推导到道德选择,运用的是层层递进法,逻辑严密,充满思辨色彩。对话体为论辩提供了平台,而论辩体则赋予了对话以思想的深度。

《孟子》中对话体与论辩体的有机结合,在对话与论辩的交替进行中,凸显人物性格,孟子的犀利、机智、刚直,君王的傲慢、困惑、虚伪,都在对话中跃然纸上。同时,孟子使论证动态化,通过预设反对意见,随后加以驳斥,使说理过程不再是静态的陈述,不再是枯燥的逻辑说理,而是一场动态激昂的思想交锋,这是《孟子》气势形成的基础。

2.2 寓言体的渗透

逻辑的形象化与哲理的故事化。寓言体是《孟子》文体互渗中最富文学色彩的一环。孟子极少进行抽象的纯理论推导,他善于运用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来阐明深奥的道理。孟子并非为寓言而寓言,而是将其作为论辩的利器。《孟子》中的寓言从行文方式上大体分为两类:其一是譬喻式寓言。这类寓言短小精悍,直接服务于论点,通过生动故事阐明哲理,如“揠苗助长”(《公孙丑上》),就批判了“义袭而取”的功利心态,形象地说明了养“浩然之气”不可急于求成的道理。寓言“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则以战场逃兵为喻,犀利地指出梁惠王与邻国执政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其二是故事性寓言。这类寓言情节相对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如“王良与嬖奚”(《滕文公下》),通过王良驾车的故事,讽刺了不循正道、苟合取容的行为。又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当时那些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利禄的虚伪之徒。此寓言已具备微型小说的雏形,其叙事之生动、讽刺之深刻,超越了单纯的论说范畴。

《孟子》寓言以其含蓄、委婉的特点,成为说理和在君王面前进行尖锐批评的有效工具。《孟子》中寓言体的运用,将抽象的伦理政治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

形象和故事,降低了理解门槛,增强了说服力和讽刺效果,实现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交融。

2.3 叙事体的穿插

历史叙事与事例论证相结合。孟子在论辩中大量援引历史故事和现实事例,这构成了叙事体的渗透。首先是历史叙事,针对政治问题提出系统主张。如孟子大量讲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故事,构建其“王道”政治理想的历史蓝图。在《梁惠王下》中,孟子通过叙述商汤、周文王施行仁政的事迹,为其“王道、仁政”思想提供历史经验支撑,强化梁惠王对其思想的认识;在《告子下》中孟子用舜、傅说、胶鬲等贤臣的发迹故事,表达“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在《离娄上》中,孟子融合了历史案例与道德论证,阐发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要思想。这些叙事不仅作为论据,其本身也具有独立的历史叙事价值。孟子还善于评点历史人物,如《万章下》中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圣贤的评价,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褒贬,为士人君子树立了道德和行为的标准。其次是时事叙事,其中包含大量对当时政治、军事事件的描述和评论。《梁惠王上》中记录了其与齐宣王论“齐桓晋文之事”的全过程。齐宣王的最大愿望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成为诸侯霸主,即表达想听“霸道”的理想,而孟子的核心主张是劝诫君主实行“仁政”和“王道”,以德行统一天下。这场对话是两种政治理念的正面交锋。首先孟子避实就虚,巧妙避开齐宣王感兴趣的“霸道”话题,转而推销自己的“王道”主张;其次孟子因势利导,从“以羊易牛”的生活小事入手,挖掘并肯定齐宣王内心的“不忍之心”,建立起他实行仁政的信心。接着孟子理清逻辑,通过“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比喻,清晰界定“不能”与“不为”,驳倒对方的借口。最终,孟子成功地将一场关于“霸道”的咨询,转变为一次关于“王道”的深刻布道,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核心政治理念。这场对话的全过程,展现了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和政治智慧。

叙事体的引入,使孟子的学说根植于历史和现实土壤,增强了论证的厚重感与可信度,避免了空疏的说教。

2.4 诗歌元素的融入

引“诗”与比兴的深化。在先秦“赋诗言志”的传统下,《孟子》大量引用《诗经》,这构成了诗歌文体向散文的渗透。首先是引“诗”证理。“孟子在阐述观点时,往往采取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清晰的论述结构。因此在引‘诗’的过程中,主要是将其作为说理环节中的重要构件,以达到环环相扣的效果^[10]。”孟子常在对话

中或论辩的结尾引用《诗经》句子，作为其论点的权威依据或结论的权威佐证，前者如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引用了《大雅·灵台》中的诗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论证其“与民同乐”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后者如在《梁惠王上》中引“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来论证“推恩”的重要性。其次是化用“诗”的比兴手法。孟子散文本身也充满了诗歌的比兴精神。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离娄上》），这种取譬设喻的方式，与《诗经》的起兴一脉相承。

《孟子》散文引“诗”，实现“诗”与“文”的义理贯通，将古老的诗歌智慧融入当下的政治伦理讨论，创造了新的意义空间。这不仅提升其散文的文化底蕴与典雅风格，使散文带上了诗的韵律和意境，文采斐然，更是在散文的理性脉络中植入了诗歌的凝练与含蓄，形成了“引经据典”的经典论证模式。比兴手法的运用则使其说理更加生动、富于感染力。

3 《孟子》的文体互渗文学效果与思想效应

《孟子》的文体互渗绝非简单的文学技巧堆砌，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多种文体的互渗交融，为《孟子》带来了非凡的文学魅力，它使一部哲学著作同时成为了一座文学高峰，以其形象性、生动性和磅礴气势，跨越时空打动着无数读者。在思想上，它把儒家“性善、仁政、士人气节”等核心观念融汇在故事、情感、辩论和人格形象中，赋予其活的精神，有效地提升了其传播力、感召力和实践效应。

3.1 《孟子》的文体互渗增强文章文学性

首先是文章风格呈现多元化。雄辩中见形象，严谨中显生动，形成了“浩然之气”与“犀利讽刺”并存的独特风格。其次极大丰富文章的表现力。突破了单一文体的局限，能够自如地驾驭说理、叙事、描写、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特别是寓言与比喻手法对后世散文、小说影响深远。再次是最大程度激活语言的生命力。孟子散文中口语（语录对话）、书面语（论说体）、诗化语言（引诗）的交织，使其语言极具张力和活力。

3.2 《孟子》的文体互渗促进其思想广泛传播

首先是深入浅出的接受效果。《孟子》多种文体的互渗，使其“性善论”“仁政”“民本”等高深的核心思想能适应不同层次的受众，尤其是寓言体和叙事体，形象生动，贴近生活，更便于传播和记忆。其次是情感与理性的和谐共鸣。逻辑说服与情感打动、故事感染相

结合，实现了从“知之”到“好之”的传播飞跃，极大地增强了其学说的影响力。

《孟子》的散文并非一种纯化的文体，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体复合场”。论辩体是其骨骼，对话体是其血肉，而寓言体、叙事体、诗歌元素则是贯通其间的神经与气脉。这种深刻的文体互渗现象，深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辩论盛行”的时代风气影响，是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家现象在《孟子》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保持强大文学魅力与思想活力的关键所在。对《孟子》文体互渗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入理解《孟子》作为哲学经典的思想内涵，更能充分领略其作为文学巨著的艺术魅力。它展示了在中国散文的早期发展阶段，各种文体元素如何被一位思想大师灵活运用，并完美地融合于说理这一核心目的之中，最终成就了一部思想与文采相得益彰的不朽经典。这一研究视角，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先秦诸子散文的生成机制与艺术特质，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史·第一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71.
- [2]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一)[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70.
- [3] 谭家健. 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39.
- [4] 章沧授. 先秦诸子散文艺术论[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6: 26.
- [5]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1.
- [6] 王艺雯. 《孟子》的文体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J]. 许昌学院学报, 2013(3): 31-34.
- [7]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 宋海燕. 试论《孟子》的论辩艺术[J]. 当代家庭教育, 2019(2): 18-19.
- [9] 董梁. 试论《孟子》论辩文的必然性和历史价值[J]. 安徽文学, 2014(5): 66-67.
- [10] 龙芳. 《孟子》引诗情况探析[J]. 今古文创, 2025(20): 44-46.

作者简介: 潘莉(1978年—), 女, 汉族, 江苏新沂人, 文学博士, 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先秦文体发生与流变研究》(项目编号: 2020SJA1105) 成果。